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进路*

姜黎黎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课题,是促进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文化符号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观念,以语言、时间、空间、政治象征等显性形态呈现。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符号“互动”,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机制。据此,应重视挖掘各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符号化”;通过专项化、多元化的社会传播,实现文化符号“扩散化”;在意义接收、解释的符号“互动”过程中,实现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意义建构与普遍认同,增强共同体成员的心理归属和身份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符号机制;文化认同

DOI: 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24.04.002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20(2024)04-0008-07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通过文化符号机制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的表征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变迁,凝聚着民族精神与文化精华。以文化符号为抓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凝聚共同目标、促进民族团结意义重大。借助文化符号机制建构同一性文化形态,以共享文化符号唤起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与心理归属,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与身份确认,形成主体意志与群体自觉,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可行的文化进路。

一、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抓手

承载着历史与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黏合剂。民族或社会的集体记忆是群

体认同的基础,社会成员在共同记忆中确认身份、强化认同。正如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宗教与文化记忆》中所述,“集体记忆的任务,首要的是传播一种集体认同”^[2]。集体记忆包括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其中,情节记忆与经验相关,这部分记忆是身临其境、亲自体验的结果;与此相对应,语义记忆和个体经验不存在直接关联,而是源于语言的意义和指称。^①无论形式为何,集体记忆的共时性互动与历时性传承,都依赖于渗透着规则、价值、意义的文化符号系统。文化符号与记忆互动,不断发挥“文化—认同”作用机制,将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引入主体观念体系,从而找到个体与群体的归属连接点。

同一性文化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②异质性群体的文化关联越强,成员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越强,共同体意识就越牢固。反之,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淡化或传播力变弱,符号对共同体的建构作用也随之减弱。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伴随国际移民族体化进程推移,“美国信念”遭到强烈冲

* 收稿日期: 2022-05-24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路径研究”(2022CKS051);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研究”(2021JK02)。

作者简介:姜黎黎(1988—),女,河南禹州人,法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参见[德]扬·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黄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页。

②参见范俊《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符号机制》,《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页。

击,源于此文化符号的民族认同危机随之加剧。^①传统民族的形成多源于自然关联,比如共同的血缘关系、地缘空间等。现代民族则呈现明显的建构性,源于自我想象、自我认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王朝国家统治时期,遗留下一个没有统一政治中心的天主教世界。在不同政治力量较量中,他们以文化符号为载体传播共同“意象”,建构个体与族群的文化联结,找到彼此认同和心理归属的依据,把统治范围内的人口重新整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文化符号维系价值共识与情感共通,成为复苏民族记忆、唤起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标识,在关键时刻转化成强大的凝聚力,以此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无论这个民族的成员规模为何,一个人不会也不可能与“自我”之外的每一个“他者”建立直接联系。同时,民族成员心中有着同生共存的文化“意象”,这成为共同体想象的依据。^②在走向人的观念世界之前,“意象”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于客观世界。文化符号的“能指”在不同群体和不同空间扩散,它的“所指”被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接收、解释,形成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动规范,在差异化群体中逐步建构同一性文化。互不见面的彼此借助共享文化符号“想象同时在场”,在符号互动中确认身份与归属,建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以上文化符号机制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机制。从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到“五族共和”的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反帝反封建,再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中国成立,无不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依据现代民族建构的一般规律可知,共同体属性的稳定需要持续有意识的建构,这依赖于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符号“互动”的机制。从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可知,符号是人类记忆尤其是集体记忆的辅助工具。当人们想要铭记某一事件、时间、场所、情

感等,符号就被作为辅助记忆物(aides-memories)创制出来,组成一个记忆遗迹的符号系统,包括国家纪念碑、仪式庆典、节日、风俗等。此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各民族平等团结的观念,逐步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性价值理念,转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石榴籽”等文化符号,在政治象征层面实现文化“符号化”。中华文化符号记录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过往,连接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它们超越物理时空与天然联结,在符号“扩散化”中“构建共同的文化形态”^③。个体生活在这一被归属的标记系统中,不断学习、记住、分享,在文化符号“互动”中集体记忆被唤起,中华民族历史变迁像画卷一样展现在眼前,“大家庭”归属感和身份意识被激发。在文化符号机制的作用下,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是人们约定的具有特殊指称的标识,是可感官的形式与象征意义的合体,它承载着民族的记忆、情感与观念。拉康(Lacan)认为,符号自诞生后就以主体不自知的方式,影响规约人的言语与行动,构建一个巨大的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表征、互动与建构作用的文化符号以语言、时间、空间、政治象征等显性形态呈现。

(一)语言文字符号

语言文字是表达、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记忆传承、民族认同的关键符号。正如安德森所言:“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⑤语言不是排除的工具,它的包容性(inclusive)极强,任何人都可以学习一种语言,这就为共同体意识传播提供可能。^⑥同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是观念表达的符号,它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语音、文字等外在形态和对象意义的合体。“能指”和“所指”的关联因时空转换及群体文化差异,产生截然

①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②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③参见[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90页。

④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不同的“意指”。因此,要深刻理解语言文字符号的对象意义,不仅需要把握语言本身,也要对它的社会性、历史性有一定了解。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诸多种类的语言文字,其中汉语言文字的受众人口最多、历时周期最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关键标识。正如龚鹏程所言,“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处在中国文字符号系统的组织和制约中”^[5]。汉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表意符号,构成了中华文化身份确认的意义体系,记录着社会秩序重构和中华文明变迁。“书同文”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打下社会根基。在以后的朝代更迭和历史变迁中,汉语汉字逐步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着中华文化精神。^①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国家更加重视语言文字符号的建构作用。“语言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6],作为中华民族的符号象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学习共享中华文化、唤起集体记忆的重要工具。各民族语言文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华大地上绽放独特魅力。同时,多样化的语言成为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交往交流的阻碍。因此,我们在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前提下,在全国尤其民族地区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水平,推动当地社会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同时,有助于广泛传播语言文字符号所承载的特殊“意指”,更好地激发符号接收者的文化认同。

(二)时间符号

时间作为一种符号,无论是时刻还是时间段,都与某一现象或事物存在关联。我们有意识地把这些有特定关联的时间,以符号的形式转化成“日”“节”,由此产生特殊的意义表征。时间符号在节日纪念中发生横向传播和代际传承,该民族的过往历史和集体记忆得以复现,逐步形成具有识别性的民族标识。

每个民族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时间符号,它们在民族身份建构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犹太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漂泊散居中依然保持民族特性,没有被散居地的民族所同化,这与他们重视时

间符号对身份确认的作用不无关联。比如,住棚节(Tabernacles)是为铭记以色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前40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逾越节(Pass-over)是为纪念如何在被奴役中走向自由而设立。^②无独有偶,中华文明也诞生了诸多值得恪守的时间符号,比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融合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向往团圆、尊敬长辈等传统。比如,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是纪念先辈同胞惨遭磨难的日子,这是中华儿女永远不能忘却的时刻。再比如,“国庆节”是为了庆祝中华民族摆脱苦难、走向新生,这一天各族人民举国欢庆、成为国家主人。时间符号记录一段历史、指称某种意义、蕴含民族文化,作为记忆辅助工具,成为中华民族身份辨识的关键符号。每一次节日的纪念都是时间符号的展演,都是把个体拉回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当集体记忆借助符号复现,“赋予裂变、碎片的个体以深度”^[7],人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共同体中的一员,各族人民的归属意识得以升华。

(三)地理符号

地理符号是人类文明与地理环境互动的结果,是人们通过特定名词指称地理事物的文化表征。^③地理环境被命名与改造的同时,主体的文化特性和精神特质就融入其中了,就不再是单纯无对象的客观存在物。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中提到,集体记忆“服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则……时而长期蛰伏,时而瞬间复活”^[8],需要包括记忆场所在内的文化符号来对抗历史遗忘。

在与自然地理互动的几千年文明史中,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个蕴含文化精华与民族特性的地理符号,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附着在地理符号之上的民族文化更为具象,以直观形式呈现在接收者面前,符号承载的记忆与历史复现。“长城”是记录中华民族沧桑巨变、民族发展的地理符号,是中华民族破除千难万险修建屏障的历史壮举的象征。当听到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勇敢坚毅、至死不渝的民族品格的回响。“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符号标识,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当听到“黄河在

①参见谢新清、王成《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基于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的启示》,《晋阳学刊》,2020年第4期,第67页。

②参见侯灵战《时间符号与民族认同》,《读书》,2001年第10期,第96页。

③参见于晓峰《地理符号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6期,第150页。

咆哮……抗日英雄真不少”,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英雄形象浮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唱出无数海外游子的中国心,无论身处何时、身在何地,民族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被地理符号的吟唱瞬间激发,因为“它所释放出来的情感正是这个共同体对自身的情感”^[9]。再比如,山东不仅是一个省份名称,同时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山东之于中国如同耶路撒冷之于西方”的说法。当地的泰山、孔庙等文化圣地,也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地理符号。毋庸置疑,上述地理符号不再是单纯的地理事物,它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成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特定标识。各族人民通过地理符号与中华文化互动,对中华民族身份进行确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强烈的心理认同。

(四)政治象征符号

生活在符号世界的人,也天然就是政治动物。政治过程中产生的具有特定指称意义的物或人,就是政治象征符号。^①政治价值观念与政治情感的展现,一般通过政治象征符号表达,以此让个体意识到自我利益与群体价值的一致性。在任何民族变迁过程中,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都融入了民族的政治文化和集体行动。政治象征符号的展演、互动,可以激发共同体成员的国家认同,形成影响政治信仰与行动的身份标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能激发国家认同的政治象征符号。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在壮士断腕的改革进程中,诞生了诸多具有特殊指称的政治象征符号,包括政治领袖符号、英雄纪念符号、价值共识符号、共同家园符号、民族团结符号等。它们代表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观念,对当时及后世的历史文化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政治领袖符号,当人们因为它的象征意义集合在一起准备行动时,群体成员对这个特殊象征符号的认同,不仅源自对政治运动规律的剖析,更有政治情感的牵连。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无可替代的政治象征符号,“孙中山”代表近代中国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伟大先驱,“毛泽东”领导中华儿女站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邓小平”带领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富起来,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的表征。政治领袖符号不会伴随领袖人物的逝世而消失,他们会成

为中华民族政治意义的永恒象征和符号指称。比如,英雄纪念符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这些英雄或名垂千古或默默无闻,他们在历史浪潮中沉淀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符号。当看到“抗日民族英雄”这一称谓,就会想到各族人民浴血奋战、抵御外辱的苦难历史。比如,价值共识符号,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凝聚在理念符号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关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更是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一个多元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国家营造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共识,将是任何国族共同体试图凝聚人心、整合分歧的关键所在。”^[10]比如,共同家园符号,新中国是各族人民历经磨难共同缔造的家园,国旗、国徽、国歌无疑是共同家园的文化象征。每当国旗升起、国歌唱响,中华儿女的家园归属感油然而生。再比如,民族团结符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进程中,呈现出不少象征民族团结的符号,古有“昭君出塞”,今有维吾尔族老人卡德尔40年记载拥军爱民故事。无论何种类型的政治象征符号,都凝聚了共同体成员的政治信仰,有助于激发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机制

现代民族的建构性,赋予文化符号之于民族共同体特殊的价值。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结构,同一性文化要素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关键。通过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及符号“互动”机制,“多元”文化建构为“共享性”文化,中华文化的普遍认同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心理归属和身份认同得以升华,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文化“符号化”

文化“符号化”,就是把文化对象的“所指”意蕴和“能指”形式提炼,成为具象化的象征符号,^②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符号机制的前提。文化传播与传承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只有经过“符号化”的文化才能超越物理时空,在差异化群体中接收、解释与建构。人是“符号的动物”^[11],人类对文化符号创制的执着,源自符号本身的象征意义与特定指称。黑格尔(Hegel)曾言,观念和热

①参见马敏《政治象征/符号的文化功能浅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0页。

②参见陈雅《地方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与创新》,《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8页。

情交织成这世界的经纬线。^①文化符号传递着时代观念与价值,记录着书写者的热烈与情感,建构一个经纬交织的秩序网。在显性的文化表征背后,隐含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历史。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它的符号化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春秋时期,推崇礼仪和秩序的儒家学派与当时诸侯争霸的形势格格不入,即便周游列国,满腹抱负的孔子及儒家文化也未被接受和广泛传播。在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儒家、法家、道家等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直到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力推下,儒家文化才成为普遍认可的文化学派,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和身份识别的象征。^②

当下,实现中华文化“符号化”需注意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创造性提炼中华文化精华,推进文化“符号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③。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中共同创造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凝聚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归属,比如“蒙古马精神”“西藏玉麦精神”等。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符号的差异与个性是符号编码的内在因素。^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多元”是实现“符号化”的基础,“一体”是文化“符号化”的宗旨和方向。新时代,我们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深入挖掘各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创造性提炼中华文化精华,“个别”文化经由“符号化”建构而上升为“共享性”文化,把“多元”凝为“一体”。2017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中华文化“符号化”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理性建构,防止文化符号的原型意义被异化。文化“符号化”看似是把抽象的文化具象化为感官符号的单向建构过程,实际还关涉文化符号的直观表达何以涵盖隐性文化。任何一个广为传播的文化符号,必定有

共同约定的特殊“意指”。当前,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冲击,部分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意义被稀释甚至解构,比如“女娲神话符号”被“魔幻变调”,“西游系列”被“歪曲变形”等。^⑤提出“作者意图论”的赫施(E·D·Hirsch)认为,可以对原作品有多重阐释,但是不能丧失理性和规范。^⑥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文化“符号化”过程中不偏离价值预设,防止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意义被异化,保证“符号化”的对象准确表达文化的本真意义。

(二)符号“扩散化”

传播学认为,符号与传播存有天然关联,传播的实质是借助符号传递、扩散符号承载的意义。^⑦据此,文化符号“扩散化”是符号承载的象征意义在受众群体中传递、散播与渗透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⑧与其他层面的认同相比,文化认同更加深入精神世界,更能实现自我认同和身份确认,它是共同体成员彼此认同的基础。^⑨要实现中华文化认同,还应推进中华文化符号“扩散化”,在多元文化群体中传播同一性文化要素,建构稳固的文化联结。

中华文化符号“扩散化”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机制,这是由文化符号的“教化”特性决定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符号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建构了一个彼岸世界。^⑩符号“扩散化”,实际是理想价值世界的构建过程,也是文化符号对共同体成员不断教化的过程。在中华文化符号“扩散化”过程中,多样态的文化符号“以文化人”,以此获得文化特性和民族精神,形塑个体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符号化的巨大象征网络中,扩散中的文化符号超越符号本身,把共通的记忆和情感传递给共同体成员,在彼岸世界建构稳定的文化联结,以此传递普遍认可的规定性,引领社会和文明朝着共同体成员期

①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年,第62页。

②参见邴正《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形象与文化符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第13页。

③参见[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④参见冯月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机制、挑战与路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29页。

⑤参见[美]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85页。

⑥参见余志鸿《传播符号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⑦参见陈伟、卢德平《共同体意识与现代性转化:中华文化符号传播的时空价值与规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11期,第13页。

⑧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待的方向发展,形塑着共同体。文化符号“扩散化”是中华文化发挥涵化功能、实现各族人民心灵相通的关键环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机制。

新时代,推进中华文化符号“扩散化”需注意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扩散路径专项化。传播学认为,专门的传播路径更精准地将内容呈现给受众,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因此,不仅要拓宽扩散范围、强化扩散力度,同时需要明确的是,中华文化符号的扩散路径必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直接关联,建立专项化的宣传教育普及机制,“涵育、引发、推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社会认同的进程”^[12]。另一方面,扩散路径多元化。融媒体时代,大数据技术、自媒体平台助力文化符号多元扩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13]。应充分利用融媒体优势,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多元化扩散,让中华文化符号以更广泛、更鲜活的形式呈现,使其成为受众者普遍认可的身份标识。2022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14]。通过组织化宣传教育和融媒体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符号的曝光度和认知度,深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直观“想象”。

(三)符号“互动”

乔治·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论认为,符号的象征意义在互动中实现。^①“意义—互动—解释”是象征意义得以产生和实现价值的前提,传播者根据“意义”行动,通过互动传递符号的原始意义,当受传者对接收到的符号进行解释,就形成新的“意义”,此过程就是符号“互动”。^②在符号“互动”中,“主我”对照“他者”的意义交换形成“客我”认识,当“主我”和“客我”合二为一,就形成社会化的“自我”,符号世界的意义互动也完成转化。“主我—客我”互动的“自我”建构过程,本质是个体归属意识与价值观念的符号化互动。通过文化符号“互动”,个体接收文化的象征意义,完成文化身份建构,在群体内部形成文化层面的意义共通与身份识别。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互动”,具

象为身份归属与情感认同的意义共契。任何一个族群,并非天然就是共同体,“所有社会都存在于想象之中”^[15]。共同体不过是人们想象的结果,这说明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互动”中,“多民族大家庭”等象征符号内隐“民族—文化”认同。当“主我”与隐含“大家庭”意识的“客我”发生互动,就会唤起“主我”的心理归属与身份识别,完成与“客我”结合的“自我”合理性建构,激发“民族—文化”认同机制。在符号“互动”中完成符号世界象征意义的转换,各族人民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升华,其身份在意义交换中识别与建构,完成个体认同与社会聚合,共同体意识融入各族人民的观念之中。从此,心理归属与群体自觉在符号“互动”中不断增强,“想象的共同体”完成合理性建构。当前,网络虚拟世界的文化符号“互动”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社会互动极具符号性”^[16],在虚拟世界,视觉、听觉等符号表达更加立体地呈现符号隐喻的文化意涵,在符号“互动”中实现“能指”与“所指”的统一^③,个体在非物理接触中完成意义转换与“自我”建构,以更高的互动频率完成身份识别,在更广的范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2).
- [2] 扬·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M].黄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7-8.
- [3] 林意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团结的凝聚功能[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83.
-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25.
- [5] 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
- [6] 木拉提·黑尼亚提.文化认同是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57.
- [7] 舒开智.传统节日、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J].天府新论,2008(2):125.
- [8]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①参见[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②参见余志鸿《传播符号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

③参见吕宇翔、张洋《短视频平台中的文化符号互动传播策略研究》,《出版广角》,2022年第2期,第71页。

- [M].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5-6.
- [9] 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M].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97.
- [10] 任军锋.全球化进程中的国族建构——以美国为例案[A]//俞可平,谭君久,谢曙光.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44.
- [1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5.
- [12]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94.
- [13] 本报评论员.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做大做强主流舆论[N].人民日报,2019-01-26(02).
- [14] 本报评论员.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N].人民日报,2022-05-23(01).
- [15] 米切尔·舒德生.文化和民族社会的整合[A]//戴安娜·克兰.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王小章,郑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
- [16] 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M].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7.
- [责任编辑:王正良]

The Cultural Symbol Approach to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JIANG Li-li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453007)

Abstract: It is a major topic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the key to promoting ethnic unit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ultural commun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val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carried by cultural symbols and presented in explicit forms, i.e. languages, time, space and political symbols, to name but a few. By means of "symbolization" of culture, "diffusion" of symbols and "interaction" among them, the cultural symbol mechanism to forg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rmed. In view of the above,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xploring fine cultural resources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goals as follow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symbo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diffusion" of cultural symbols by means of specialized and diversified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universal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by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 process of meaning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psychological belonging and identity of community members, and constantly fostering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ultural Symbol Mechanism, Cultural Identity